

前 言

历史学家研究指出，北宋建立之前的二百年左右时间，广大的中国土地上，出现封建割据的混乱时期。安史之乱把繁荣的大唐帝国拖向衰落，地方藩镇的分裂割据，使中央集权政府软弱无力。从开平元年（907）朱温灭唐建梁，又掀开了绵延五十余年的五代十国时期。王朝兴衰指顾间，小国存亡转瞬里，五个王朝，十个小王国先后杀伐混战，兴亡朝夕，使中原大地和广大汉族聚居的地区狼烟四起，盛唐以来积聚的物质财富和文化典籍，被摧毁得七零八落。

显德七年（960），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策动陈桥驿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政权，改国号为宋，开启了北宋王朝的历史。赵匡胤行伍出身，善于征战，很快制定了统一中国的政策，先南后北，先易后难，经过近二十年的战争，才在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结束了五代十国混乱分裂的局面，统一了中国大部。只是这个时候，赵匡胤已死，当皇帝的是他的弟弟赵匡义，史称宋太宗。从此，宋王朝便开始了经济建设的时期，创造了继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新高峰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赵匡胤是有功绩的，《宋史》说北宋“三代而降，考论声明文物之治，道德仁义之风，於汉唐盖无让焉”。北宋王朝承袭汉唐历史的积累，很快地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王朝。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

繁荣，欧阳修正是在这个走向繁荣的时代走进历史的，而他也在这个转变时期，恰如其分地承担了文化承前启后的任务，使他成为北宋文学之父。

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学之父，基于他全面而高度的文学成就，也基于他文化人格的重大影响。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，勾勒这位北宋文学之父的面貌。

第一方面，欧阳修全面地开拓了宋代文学新的风气。这个风气包括了文学扩大的内涵、风格、语言和社会功能等方面。

首先当然是古文，实则是以较为平实较接近口语的文言文去议论、叙事、抒情。在文学史上，欧阳修往往被列入古文唐宋八大家而著称。应当承认，复兴先秦时期鲜活有力的古文，韩愈有不世之功。所以，苏轼在《居士集序》中说，自汉以来，“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……愈之后三百有余年，而后得欧阳子”。唐之韩愈与宋之欧阳修，都是古文复兴的一代功臣。欧阳修是在宋代古文写作开山作者石介、柳开等人揭示新文风开始进入文坛的。但欧阳修的古文，起点却超越石介、柳开，直接与韩愈接轨。欧阳修古文以明道与宗唐入手，又结合北宋文化普遍性和世俗化的氛围，创造性地把抽象的明道，寓于具象的抒述之中；把申述儒家最高理想，贯于日常社会现象之中。因此，欧阳修的古文，重应用切实，重以情感人，重自然畅达。鉴于中国汉语发展上，语言和文言分离的现实，距古愈远，语与文分离越甚。宋代的文言与口语，比之唐代差异更大，我们从今日见到的口语化的话本小说，与文士的高头讲章相较，就可明了。因此，欧阳修在韩愈深奥与平易两种文风中，推崇的是平易的文从字顺，这显然是符合当时语言发展状况的。欧阳修还在古文中应用了近乎口语的词汇句式，极少用典，极少用生僻词字，也是基于北宋社会的语言状况。另一方面，欧阳修是个重情的人，笔端常带感情，因此，他

的古文寓理于情，以情动人，使一些言事说理的文字，也很有感情色彩。明道的内涵，化解在委婉情致之中，古文就更有感染力。宋以后古文散文寓理于情，寓情于（物）象的传统，无疑有欧阳修开拓的作用。因此，在中国古代古文发展史上，推举欧阳修为北宋第一人，是恰当的。

欧阳修的诗名不如文名之大，部分的原因是，与欧阳修同时期的两位老朋友苏舜钦和梅尧臣，在诗歌创作方面有更大的创获。但是，欧阳修对宋诗的贡献，却是苏、梅所不及的，便是奠定了宋诗深远闲淡的方向。所谓深远，就是诗中具有哲理趣味，“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”。所谓闲淡，就是风格闲适，语言平易，既不艰晦，亦不浅俗。欧阳修的《六一诗话》，是我国诗论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形式评论诗歌的集子，开诗论中诗话一体，影响深远。宋人论诗的热情，超迈历史上以诗著称的唐，更无论秦汉了。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上并非弱手，八百多首诗，各体兼备，内容丰富，可与苏、梅并驾。因此，开拓有宋一代诗风，欧阳修是先行者。

欧阳修的词，在北宋时为人称道不多，甚至有人认为，欧阳修的词亦有鄙亵之语，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，从卫道角度去保护欧阳修。欧阳修的门人苏轼，在概括乃师成就时说：“论大道似韩愈，论事似陆贽，记事似司马迁，诗赋似李白。”竟不涉及词。这是有原因的，主要是五代以来，词是作为歌宴侑酒之曲，声节缓慢柔媚，叙写男女恋情，被目为小道，为艳科，士大夫偶有所作，也常是随兴之笔，甚至晚年編集不收词作。北宋初年，大臣巨公大多填词，而词的内容，多数不出《花间》柔婉的抒情路子。欧阳修在这个文学氛围中参加填词，自己又是个用情之人，所以许多词作，仍然在男女恋情内兜圈子，是不奇怪的。但是，作为一代文学开拓者，他的创造性也在词作中凸现出来。直到近

代词学家回顾宋词源流衍变，宏观其脉络，才比较明白地看出欧阳修词对词一体发展的重要意义。冯煦在《宋六十家词选例言》中就说：“宋至文忠，文始复古，天下翕然师尊之，风尚为之一变。即以词言，亦疏隽开子瞻，深婉开少游。本传云：‘超然独骛，众莫能及。’独其文乎哉？独其文乎哉？”这倒是词学理论家冷静的评价。欧阳修的词作，相当部分是《花间》路子，无庸讳言。即使章法的严谨，语言的流畅，修辞的巧妙，亦是为婉约情词服务的。欧阳修词对于宋词的贡献，主要有三类作品，具有先导意义。第一类为述怀词，在词中结合个人身世升沉，直抒胸臆，把诗歌中的述怀一类，直接移到词作里，摆脱了词只供侑酒行乐的局限，而赋予词作个体生命与社会内涵。《朝中措》（平山栏槛倚晴空）、《浣溪沙》（堤上游人逐画船）等作，都有鲜明的自我形象。词从五代大多数作品的恋情共性，延伸到词人的个性体现，词创作就可跳出共同主题的小圈子，走向丰富性。第二类为即景词。诗有即景题诗，词也当有即景填词。欧阳修的即景填词，最为明显的特点，一是结合自身感悟，一是数首或十首成编，连续吟唱。号称“西湖念语”的《采桑子》十三首，是欧阳修退仕回到颍州西湖居处所作。西湖的景状物态，与作者的心绪变化，都化入一幅幅具象鲜明的画图之中。这些作品，无疑也扩大了词的容量。最后第三类作品，是开拓一种豪洒的词风，把歌宴席上曼声柔唱的词，带到金戈铁马的壮伟场面上。这一点，欧阳修的师友范仲淹《苏幕遮》（碧云天）《渔家傲》（塞下秋来风景异）已经开其端了。欧阳修的《渔家傲》（十二月鼓子词）分别吟唱一月至十二月各月的活动，既有浓郁的民俗气息，更摆脱柔婉凄丽的束缚，显示一种豪洒超迈的艺术风格，为以后苏轼的豪放词作了先导。至于欧阳修词中极重视炼句，已成宋词特色。宋词中一些名句，如“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”，“衣

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销得人憔悴”，“平芜尽处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”，“独立小桥风满袖，平林新月人归后”等等，它们所结构的意象，有很大的思绪容量，已被后代人们不断重现在诗作词作中。与欧阳修同时有著名词人张先、晏殊等，稍后则大家如群星灿烂，不免使欧阳修词名受到掩抑。我们检点欧词，把它们放到宋词发展的链条上审视，就会感到，欧阳修在词创作方面，无疑起了承先启后的开拓作用。

欧阳修在古文、诗歌、词的写作上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，使他在 11 世纪上半叶的文坛上，居于领袖地位，已是当时文坛的共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欧阳修文学创作的先导意义，人们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。

第二方面，欧阳修树立一种学者化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人的典型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人们追慕的人物。陈寅恪先生在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中指出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就是说，中国封建文明的极盛，是宋代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北宋。北宋文化全面的繁荣和经济繁荣、科技发展、文化普及等历史条件分不开。这个时代出现的文化人，就不仅仅是在某一方面有特殊成就的人物。就个体而言，他具有全面的文化修养，各方面均有高度的成就，集学者、政治家、诗人、古文家、词人于一身。在 11 世纪上半叶，欧阳修可说是一个代表，有楷模意义。欧阳修不只是一个文人，而且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文化人。在政治上他做到参知政事，直接参与政坛中枢的运作，两次柄文衡大权，选贤荐才；他在文学各体的创作上，取得很高的成就；他是学者，探研经学、史学，有骄人业绩；他是艺术鉴赏家，对书道、图画、音乐有独到见解；他还是金石学家，考订论析大量碑帖，究其源流。甚至药物的使用，茶酒的品评，亦有灼见。这里只就经学和史学上的成绩，概述一下欧阳修

作为学者的意义。

经学发展至宋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。宋人解经，以阐发自己的理解为主，摈弃汉儒字斟句酌的束缚，形成经学中的宋学一派。欧阳修有《诗本义》16卷，以及大量论述经学的文章。他在《本末论》中提出：“求诗人之意，达圣人之志者，经师之本也；讲太师之职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，经师之末也。”就是说，只求经籍上训诂考订，是经学之末，而阐述诗人之意、圣人之志，是经学之本。其实，欧阳修也明白，毛公《诗诂训传》和郑玄《毛诗传笺》，无非是汉人以解《诗经》来表述他们对当代社会思想制度的臧否。欧阳修强调要体会《诗经》“诗人之意”，更多从接受学的角度，站在宋代的历史阶段，对《诗经》重新认识。欧阳修的阐释，当然也有谬误，但他振兴了一种疑经惑传的风气。以怀疑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前代学者的著作，作出新的判断，树立新的诠释，这便是宋学给学坛带来的新风气。欧阳修在其中起积极作用。

欧阳修还有《易童子问》3卷，《春秋论》和《春秋或问》等，都是批评在经学研究中各种不切实的说法的。欧阳修不算是个经学家，他的经学研究无非表明：他积极推进宋代疑古创新的经学思潮的成熟。他的研究成绩表明他是一个有眼光有水平的学者。

作为学者素质的体现，更多在史学研究上。欧阳修尊重历史，多年认真钻研，著有《新五代史》74卷，《新唐书》本纪10卷、志50卷、表15卷，还有大量历史评论。欧阳修史学著作的得失，自有史学界的评论，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，欧阳修的史学著作，一直受到重视。清人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十一以“欧史书法谨严”评论道：“不阅《旧唐书》，不知《新唐书》之综核也；不阅薛史，不知欧史之简严也。欧史不唯文章洁净，直

追《史记》，而以《春秋》书法，寓褒贬于纪传之中，则虽《史记》亦不及也。”这个评价可谓高矣，现在看来，欧阳修的褒贬，未必都是恰当的。但是，这恰恰表达了宋人对以前历史的认识，所以欧阳修自己说所修的《新五代史》是“乱世之书”。欧阳修撰述史学著作，并非个人的行为，而是宋代的学风，即为政者修史，显示文化的全面发展。在史学著作中，欧阳修不仅收集编整巨量历史资料，而且在体例、表述、语言、章法等方面，亦有新的尝试。人们从欧阳修大量史学著作中不难看出，欧阳修是一个值得敬重的学者。

欧阳修是一个知识渊博又勤奋好学的学者。他嗜好收集碑帖铭文，从庆历五年（1045）至嘉祐七年（1062）近二十年间，收集千卷，编成《集古录》，同时在所收的碑帖铭文之后，写下自己的考订、评论、品鉴、溯源各方面的意见，成《集古录跋尾》，今存十卷，四百余篇。欧阳修不是古董商，他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去收集古代碑铭的，所以他的收集和他的史学、文学和书学的探究，直接发生联系。他用地上或地下发掘出的碑铭材料，订证史实，纠误改错，拾遗补缺。欧阳修撰《新五代史》、《新唐书》，也得益于他所收集的碑帖铭文。把收集碑铭当作一门学问，并贯通到自己的著作中去，在宋代以前是很少的，欧阳修是开风气人物之一，故而朱熹大为赞叹，认为“集录金石，于古初无，盖自欧阳文忠公始”。朱熹评价未免有溢美之嫌，因为前人已有集录金石的活动，只是没有像欧阳修那样，把集录金石与著述史书结合起来。不过，以欧阳修的盛名而集录金石，在北宋无疑起推波助澜作用。尔后洪适、曾宏父、吕大临、薛尚功、赵明诚诸人，也大量集录古代金石碑刻，使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金石学，蓬勃发展，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重要的部分。

欧阳修留心家乡文献、家族承传，他撰《欧阳氏谱图》实为

方志学中族谱一种，别亲疏，分繁简，清楚实用，为后人所仿效。

欧阳修还是个艺术鉴赏家。他对书法、音乐、美术有很高的鉴赏力。欧阳修推崇唐代书法，特别称许颜真卿。说：“自唐末干戈之乱，儒学文章，扫地而尽。宋兴，百年之间，雄文硕儒，比肩而出，独字学久而不振，未能比踪唐之人，余每以为恨。”（《集古录跋尾》卷四）这是他对当时书坛的判断，无疑是对宋代书法发展的激励。北宋书坛四大家苏轼、米芾、黄庭坚和蔡襄，成名都由欧阳修之后，书法又都由唐代颜真卿书法演变而来，这里当然有欧阳修鼓励宣扬的影响。欧阳修评论书法，常把时代气氛与书法特点联系起来，特别是把士人（书者）的人格与书法的品格合而观之，说南朝士人气尚卑弱，所以书法以纤劲清媚为工；说唐代强盛，人字皆不俗，尤以楷书及行草特佳。这些评论，大抵符合书法发展的历史。欧阳修自己书学颜鲁公，工整秀丽，虽然自谦“字体不工，不能到古人佳处”，但实已达到很高的水平。宋代书坛四大家之首的苏轼，是这样评价老师的字的：“文忠公书，自是学者所共仪型，庶几如见其人者。正使不工，犹当传宝，况其精勤敏妙，自成一家乎！”重要的是，欧阳修的书学，已为当时士人尊为学者仪型，可见影响之巨。至于音乐、美术方面的鉴赏力，我们可从他诗文对听乐观画的刻画中见出，此处不赘。

欧阳修在经学、史学、金石学、谱牒学、书学乃至音乐、美术各方面深湛的学识和渊博的修养，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，一个文学家，而且是一个全面发展、有多方面贡献的学者型的文化人。正是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积淀，到宋代应是出现封建文化极致的时代，也是出现具有文化全才的新一代文化人的时代。这种文化全才式的文化人在北宋出现，欧阳修是第一人。他的出

现，无疑推导了一种积极的文化风尚。从北宋开始，文化人都力求在文化各方面发展，也涌现如苏轼、王安石、黄庭坚、司马光等一大批全才式的文化士人，全面地推进古代封建文化的繁荣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宋代显然超过唐代，而欧阳修作为北宋第一人，尤其值得称赞。

第三方面，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领袖，始终坚持在一个璀璨的星座之中居于最明亮的一颗星的位置。就是说，在北宋文化改革，树立一代有特色文化的过程中，欧阳修起着重大的团结、组织、扶持、培养的作用，把同年龄一代文士，与晚辈一代文士，都集合到文化改革（包括古文复兴）的潮流中，形成巨大的意识力量。欧阳修从踏入仕途，到洛阳为官的时候，就深感文化思潮必须要有一伙志同道合的朋友推动。当时钱惟演以宽容的胸怀和重才的见识，团结了大批有才能有志气的青年文士，对宋代古文复兴起很好的作用。欧阳修初出茅庐，即在这个文化氛围中，很快形成古文与诗歌写作的新观念新手法。所以，当欧阳修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，他就尽可能团结更多的文士，权力越大，团结越广。

在欧阳修的周围，有许多在北宋政坛、文坛上曾起过较大影响的人物。即如在洛阳时期，青年欧阳修就结交了诗友梅尧臣、苏舜钦，文友谢绛、尹洙、石介、穆修、尹源、富弼、王复、杨愈；词友张先等。这些人日后几十年间，大都成为欧阳修诗文革新活动的积极支持者。庆历新政时期，欧阳修以其坚定的改革精神，赢得一批政坛师友。他曾荐举余靖、王素、蔡襄等任谏官，又与中枢首辅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等人结成政治同盟，即便遭贬谪，友情不失，而且形成改革诗文的重要力量。庆历新政失败后十年，欧阳修重返京师任翰林学士，当时富弼、包拯、胡宿也回到京师任职，士大夫深庆朝廷得人，称这四个人为“四

真”：“富公真宰相，永叔真翰林学士，胡先生真先生，包公真中丞。”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，在那篇芜杂的《先公事迹》中有一段话：“先公平生，以奖进贤材为己任。一时贤士大夫，虽潜晦不为人知者，知之，无不称誉，荐举极力而后已。既为当世宗师，凡后进之士，公所称者，遂为名人。”这几句话，也是说明欧阳修善于团结、使用人材。

欧阳修在革新诗文中，极其注意培养、提携大批有志于此的晚辈士人。他的门人苏轼，后来回顾这件事，评价极高，在《钱塘勤上人诗集叙》（见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）中借题怀念乃师说：“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，士有一言中于道，不远千里而求之，甚于士之求公。以故尽致天下豪俊，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固多矣。”最有代表性的是，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欧阳修主持礼部试。《宋史》传中说：“时士子尚为怪险奇涩之文，号‘大学体’，修痛排抑之，凡如是者辄黜。毕事，向之嚣薄者伺修出，聚噪于马首，街逻不能制；然场屋之习，从是遂变。”这一科，欧阳修选拔了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程颢、张载等为进士，用衡文之权，壮大了诗文革新队伍的力量。欧阳修去世时，许多门人晚辈撰写祭文，怀念欧公。曾巩说：“（欧阳修）爱养人材，奖成诱掖，甄拔寒素，振兴滞屈，以为己任，无有废拂。”苏轼说：“民有父母，国有蓍龟，斯文有传，学者有师，君子有所恃而不恐，小人有所畏而不为，譬如大川乔岳，虽不见其运动，而功利之及于物者，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。”王安石极力称许欧阳修的文章：“公器质之深厚，知识之高远，而辅以学术之精微，故形于文章，见于议论，豪健俊伟，怪巧瑰琦，其积于中者，浩如江河之停蓄；其发于外者，烂如日星之光辉。其清音幽韵，如飘风急雨之骤至；其雄辞阔辩，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。世之学者，无问乎识与不识，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！”苏辙则回顾欧阳修选拔进士的豪

举：“群疑相逐，公恬不惊，众惑徐开，滔滔狂澜，中道而回。”后来被学者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三苏、曾巩、王安石五人，除老苏和欧阳修平辈相交，并受欧阳修举荐外，大苏小苏、曾王四人，皆是欧阳修晚辈，而大苏小苏、曾巩三人皆是门下。唐宋八大家在宋六人，是以欧阳修为承前启后的，他是开宋文的导师。

欧阳修团结师友、晚辈、门人，有一个鲜明的目的：改变文坛风气，开宋代文学的方向。他的目的达到了，所以，欧阳修去世时，朝廷研究他的谥诰，制文中有一段至今仍不虚妄的话，可代表当时人们对文坛上欧阳修的评价：

公维圣宗贤臣，一世学者之所师法。明于道德，见于文章，究览六经群史、诸子百氏，驰骋贯穿，述作千百万言，以传先王之遗意。其文卓然自成一家，比司马迁、扬雄、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。方天下溺于末习，为章句声律之时，闻公之风，一变为古文，咸知趋向根本，使朝廷文明，不愧于三代汉唐者，太师之功！

可见宋代人是承认文学之父是欧阳修的。不过，谥诰忘记了一个重要事实，就是欧阳修不仅仅以个人扭转风气的文章居当时文坛班首的，而是以一个文学思潮的领导者、组织者的身份，团结大批革新诗文的士人，以辉煌的业绩，树立了宋代文学独有的面貌和不可取代的地位。

作为一代文学的开山祖，并不是一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，这也是文化史上常见的事情。欧阳修学富五车，全面推进有宋一代文学的道路，但在单体文学形式上也有未达极致的现象即便在宋代，他的古文声望，比不上苏轼；诗不及苏轼、黄庭坚；词不及苏轼、辛弃疾、秦观；史学不及司马光；经学不及二程、张载；金石学不及洪适、赵明诚，等等。总之，宋代文坛或学坛每一步的成就，几乎都有欧阳修的痕迹，但每一类型的最高成就，

却不是开山祖所能享受的。这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的，正如急湍激溅的金沙江，不能像近海处的长江那样宽阔浩荡一样。

欧阳修之后的半个世纪，可以说是北宋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，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最繁荣的时期。文化的各种载体，都出现一批巨人，他们的成就，使整个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人们钦佩礼赞。可惜，北宋的文化繁荣，并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。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迅速强盛，终于以文化弱而军事强的蒙古族政权，取代了文化强而军事弱的宋王朝。北宋的灭亡，中断了封建文化最繁荣时期的历史，偏安东南的南宋，“直把杭州当汴州”，但那不过是一场永不重复的繁华梦而已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文化遗产并不都如王朝覆灭一样消失，文化有着永恒的意义，积淀在民族的意识里。欧阳修这位宋代文学之父，他的业绩和他的影响，千余年来人们仍然能感受到。

欧阳修暮年写诗很少了，但在《寄答王仲仪太尉素》一诗中有两句云：“换骨莫求丹九转，荣名岂在禄千钟。”他生前相当豁达，既不想学道长生，也不求荣华富贵，他追慕的是，千载之下的荣誉。事实上，欧阳修做到了，他不仅开辟了有宋一代的文学道路，而且以他的人格与作品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。

一 时代和家庭

宋真宗景德四年（1007）农历六月二十一日，都城开封府正笼罩在秋晨的氤氲中，皇城内紫宸殿五日一朝的常参仪式开始了。

宋承唐制，朝政活动，皇帝日御垂拱殿，与宰相等高级文武官员议事，谓之常参。五日一朝，官百司朝官以上，由宰相押班朝见奏事，谓之六参。是日，宰相、枢密使、文明殿学士、三司使、翰林枢密、直学士、中书舍人、三司副使、知起居注、皇城内监库藏朝官诸司使副等文官，亲王侍卫、亲军马步都指挥使率军校，至副都指挥使、次使，相次节度使等武官，排班进入紫宸殿（又称崇德殿）。枢密使以下就班候升坐，香烟缭绕，雅乐庄严。宰相最后从文武官员两列中走进，有司高声赞喝，然后宰相率文武百官，行礼如仪。坐在皇座上的真宗，正是 39 岁的壮年，踌躇满志，望着殿下的文武百官。50 岁的王旦，本年二月才担任参知政事加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（宰相），取代了脾气刚烈的寇准。王旦是个守成之相，正派却懦弱。同时的执政官王钦若是尚书左丞，赵安仁自知制诰翰林学士知右谏议大夫除知政事，韩崇训自枢密都承旨四方节使加检校太傅，马知节自枢密都承旨东上阁门使加检校太保并签书枢密。当年，王旦 50 岁，王钦若 45 岁，两人年岁相差不远，但品性却大不相同。正是这个

王钦若，指责三年前宋与西夏和议的澶渊之盟为城下之盟，当时宰相寇准应承其咎，危言耸听，使寇准罢相。后来，又是王钦若伪造天书、宣扬全国符瑞，搞太山封禅、汾阴祭祀等造神活动，阴险狡诈，被时人称为政坛“五鬼”之一。当日，朝廷上下没有特殊大事，王旦松了一口气，真宗仍然矜持地回后宫去了。

真宗是北宋第三朝皇帝，继承的是太祖赵匡胤、太宗赵光义兄弟的江山。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建立宋朝的那一年（公元 960 年），真宗赵恒还没有出生。宋朝经过太祖赵匡胤 16 年治理、太宗赵光义 21 年统治，终于治理出一个政权稳定、经济发展、社会安定、生活逐步富足的时代。

北宋政权建立最初 20 年，先后合并荆湘，西讨后蜀，攻取南汉，讨伐南唐，统一吴越和泉、漳的陈洪，灭亡北汉，从而统一了华北、华东、华南、中原、西南大片领土。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云：“天下统一，疆理几复汉唐之旧，其未入职方氏者，唯燕云十六州而已。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……当是时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，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。视西汉盛时，盖有加焉。隋唐疆理虽广，而户口皆有所不及。”五代十国混乱的政治局面结束，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。太祖、太宗又执行了一系列稳定政局、偃武兴文的政策，集中兵权，整顿军队，调整行政机构及权限，集中财政权限，完善科举制度等等，使宋朝成为一个汉唐以后统一的稳定的封建王朝，从而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。真宗继位，大局已定。这位北宋第三个皇帝，把精力放在恢复生产，增殖人口，发展经济上。

真宗即位时，29 岁，很有些奋发有为的志气。他的父亲太宗接受过直史馆的田锡建议：“欲理外，先理内，内既理则外自安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十，端拱二年正月）太宗自己也

表达过同样见解。（《长编》卷三十二，淳化二年八月丁亥）先内后外的政策，从太宗开始，成为北宋一朝的国策。不过，宋太祖、太宗统一中国时，还有黄河以北和东北地区的两个部族国家西夏和辽（契丹），盘踞大片土地。特别是辽国，在太宗晚年和真宗即位之后，不断派兵向南掠人夺地，屠杀百姓。河北广大地区，成了辽兵驰骋之地。因此，宋辽之间和战问题，成为宋王朝能否走向繁荣的关键。景德元年（1004），辽兵大举南下，深入宋境，直向黄河。真宗听从了宰相寇准、毕士安的建议，决定御驾亲征。几十万宋军渡过黄河，进驻军事重镇澶州，准备决一死战。辽军孤军深入，又无战胜宋军把握，多次试击皆败，不得已向宋朝议和。经过交涉，订立盟约，宋辽结为兄弟之国，宋每年给辽国银 10 万两，绢 20 万匹，叫做“岁币”。双方边界和平共处。这个盟约，史书称为“澶渊之盟”。澶渊之盟断绝了宋统一黄河以北大片土地的奢望，也培育了日后覆灭宋朝的北方民族政权。但是，盟约最大的好处，是保持了宋辽近百年的和平相处，边界的稳定，和平的环境，给宋朝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。北宋繁荣时期，在真宗时代便开始了。至于向辽国的“岁币”，对宋朝并不成负担。仅当时河北路一处官府，每年向农民预借钱帛，按期归还，利息收入每岁绢 70 万匹。河北路不是产绢要地，全国可以想见。以宋皇族官僚享乐生活糜费而言，“岁币”只是很少的数目。

真宗除了与辽订盟，稳定边境之外，国内还执行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，诸如打击长期拒交赋税的豪强地主，募民垦荒，免除某些租税徭役，兴修水利等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很快。宋王朝是基本上不战而建的，太祖、太宗又有意采取多置官以安人心的手法，以致冗官成为北宋一代解决不了的问题。真宗即位后，曾采取裁减冗官政策，仅咸平四年（1001）一次裁掉冗官冗吏十九

万五千多人。精简政府机构，减少支出，也缓和官民矛盾，收到良好效果。当然，冗官冗吏问题，不能一次性解决，以后也成为长期困扰北宋政权的大问题。但是，真宗青壮年时的作为，的确使宋朝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度，而这位壮年的皇帝，在礼拜歌颂声中，开始走向自大。真宗于公元 1004 年改元景德以后，几年间水旱虫灾较少，“京东蝻生，闽飓风，不害稼”，“博州蛭不为灾”；“诸路丰稔，淮蔡间麦斗十钱，粳米斛二百”；“岁稔，米斗七八钱”，农业生产收成较好，粮钱丰裕，更助长真宗一朝上下享乐骄奢。

欧阳修正是这个时期来到人间。景德四年（1007）农历六月二十一日（公历 8 月 6 日），欧阳修出生在四川绵州。当时，父亲欧阳观任绵州军事推官。

绵州属成都府路，是北宋版图最西边的区域，靠北是西北军事要地秦凤路，靠南是大理国，靠西是吐蕃国，只有东面利州、梓州延伸各路，直向首都东京。成都府路包括府城成都，十二个州。绵州在成都府路东北边沿，成都平原的北部边沿地带，与东北方的利州、东方的梓州接壤，是上等州之一，宋朝时拥有巴西、彰明、魏城、罗江、盐泉五个县，一十二万二千九百多户，二十三万多人口，盛产綾、纴、布等丝棉纺织品，治所崇宁（今绵阳市）。绵州还盛产井盐，在宋代是政府专控的经济活动，收益颇丰。绵州处宋与吐蕃边地，当然也是屯军的地区，知州就兼领节制屯戍军马的沿边安抚使。从北宋版图上，绵州不是贫困州府，而是具有较富庶经济实力又关系西部边境安全的军州，有较重要的地位。州设推官，是司法官吏，负责勘问刑狱，查清案情，提供法律依据，上报主官。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就担任绵州推官。在地方政权中，推官只是一个下级官员，但涉及具体刑狱，当事者必须慎重。欧阳观是一位公正、谨慎的刑狱官员。欧

阳修的儿女亲家吴充在《欧阳修行状》中记述去世多年的欧阳观时还称赞说欧阳观：“少孤力学，咸平中进士及第，天性仁孝，居官决狱，主於平恕哀矜。”目前还未能考定欧阳观是何年到绵州推官任上的，但可以确定，只做了一任，就升调至淮南东路的泰州任军事判官了。从绵阳往泰州路途几千里，当时欧阳修还在襁褓之中。

泰州是淮南东路十州之一，虽然地处长江以北，却是有江南风景的富庶地方，距富庶繁华的扬州很近。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，当时泰州辖区较小，原来管辖四个县，到南宋又把其中两个县划了出去。不过，面积比绵州小得多的泰州，却有五万六千多户，十一万七千多人，以纺织品和农产品著称。对于原籍江南的欧阳观，年老得以调任长江沿岸的州县，当然是一种安慰。实际上，欧阳观抵泰州军事判官任上，已经是五十七八岁，年近花甲了。这几年仕宦，欧阳观内心还是高兴的，特别是 55 岁时晚年得子，续弦郑氏生下欧阳修；过二年又生下一个小女儿，夫妇相敬，子女天真，一家和睦，欧阳观度过了生命中最甜密的最后的岁月。他所担任的判官，也是审判案件的工作，负责维护一州司法尊严。

大中祥符三年（1010），欧阳观 59 岁，卒于泰州军事判官任上。当年，欧阳修才 4 岁，下面还有一个妹妹。母亲郑氏才 29 岁，年轻守寡，又毫无收入，家庭一下子陷入困顿之中。父亲的去世，改变了欧阳修的命运，迫他走上一条自我奋斗的生活道路。

至此，我们可以回顾欧阳一族的传承关系了。

欧阳修很重视自己家族的谱系，曾经写过《欧阳氏谱图序》，开宗明义标出籍贯“吉州、庐陵县、儒林乡、欧桂里”。关于籍贯，后人有许多说法，按下不表。图序以欧阳修的了解，写下欧